

國家霸權與教育：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身份¹

黃庭康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的目的是比較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間新加坡及香港國家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與華文學校身份(identity)的相互關係。國家權力形構是統治權力建構的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統治階層致力贏取統治的合法性；防止社會的衝突分裂；以及打敗(outmaneaver)敵對的勢力(Green, 1990; Wong, 2002; Wong and Apple, 2002)。華文學校以中國語言為主要的教學媒介；它的身份取決於它的文化獨一性(cultural exclusiveness)。當出現下列三項條件時，華文學校的身份是最清晰、最鮮明的：

- (1) 華文學校只採用中國語言為教學媒介；
- (2) 在整個教育系統中，只有華文學校採用中國語言教學；
- (3) 在整個教育系統中只有華文學校教授中國文化相關科目(例如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²

¹ 本文是〈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的比較研究：亞洲華人社會現況之比較〉，【市場、國家與教育：一個多層次的教育社會學研究】第三年研究報告(部份)，NSC 91-2745-P-343-001，國科會提昇私大研究能量專案，2003，嘉義：南華大學。

² 本文華文學校身份的概念源自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啟發。伯氏曾提出分類(classification)的概念分析學校課程中各學科之間界限的分明度(Bernstein, 1975, pp. 85-115)。本文借用此概念討論教育系統中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差異程度。

國家權力形構與華文學校身份的關係是微妙、互動、及深受特殊歷史條件所影響的。首先，國家政策會影響華文學校的身份。因為新加坡及香港的統治者的政策都會調理(regulate)各源流(streams)學校的教學語言及課程。³ 因此，國家政策往往在有意圖或無意圖(intentionally or not)的情況下改變了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區隔。

其次，華文學校身份能影響國家權力形構。倘若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差距過份鮮明，華文學校學生與其他學校畢業生在語言、文化、及世界觀方面就會出現巨大的差距，最終可能對社會整合帶來不良的影響。此外，當華文學校具有鮮明的身份，整個教育系統中只有華校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化，華文學校被視為是承擔著保存華族語言、文化的重大使命，華人對華校的存亡及發展甚為關注。倘若政府沒有順應華人的期望支持華文學校，敵對的勢力很容易以「歧視中華文化」為號召攻擊執政者。為了避免矛盾的除化，統治階層必須調整教學媒介、課程、及教育財政(education financing)的政策，以處理因華校身份過度鮮明所衍生的問題。

此外，綜合以上兩點，因為國家對教育系統的介入往往會在無意中強化成削弱華文學校的文化特徵，執政當局的政策往往會在無意圖的情況(unintentionally)引發或避免社會衝突分裂，最終改變了國家權力形構的歷史過程。

在本文中，我將根據以上的理論架構討論戰後新加坡及香港國家權力形構及華文學校身份的微妙關係。在戰後初年新加坡英殖民政府試圖以大量興建英文學校的方式扼殺華文學校生存的空間。其後，是項政策失敗，執政當局迫使華文學校改用英語教學，以淡化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鴻

³ 各源流學校是指使用不同語言作為教學媒介的學校。例如戰後新加坡有英文學校、華文學校、馬來學校、及印度學校(Tamil Schools)四大源流。

溝。然而，這策略導致華人強烈的反彈，華人視政府陰謀消滅中國文化。面對這壓力，執政當局最終被迫承認華文學校是新加坡教育系統的一部份，肯定華校應享有政府的平等對待。香港的情況與新加坡迥異。戰後香港殖民地政府從來沒有意圖消滅華文學校或削弱華文學校的身份。然而，政府的許多政策卻導致整個教育系統的華化(sinicization)，減弱了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文化的差距。結果使敵對勢力無法以「歧視華人文化」為藉口攻擊殖民地當局。

新加坡

替代策略(substitution approach)

戰後新加坡殖民政府首先以替代(substitution)的方式處理華校身份的問題。替代是最具壓迫性的文化介入(cultural intervention)策略，它的目的是以急速擴展英文學校的方式淘汰華文學校。替代策略源自於新加坡政府在一九四九年的十年補充計劃(Ten-Year Supplementary Plan)。然而，由於政府沒有足夠能力(capacity)執行興建學校的計劃，替代策略最終並沒有成功。

在一九四六年，新加坡政府草擬了戰後的第一份教育政策文件——《新加坡未來教育政策計劃》(A Plan for Future Educational Policy in Singapore)。是份文件指出「基礎教育應通過母語進行」。⁴ 在這前提下，它建議新加坡政府以馬來語、華語、及印度淡米爾語(Tamil)等母語發展免費的小學教育。此外，是項文件認為英文學校只應讓以英語為母語的學

⁴ Minutes, the 28th public session, Advisory Council, Colony of Singapore, 24th July, 1947, Appendix III, *The Ten Years' Program*, p. 23.

童就讀。⁵ 它建議在未來十年興建一百所官方的方言(vernacular)學校。⁶ 然而，其後該份政策文件交由新加坡諮詢議會(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審閱，遭受議會成員的猛烈攻擊。⁷ 他們指出英語仍是當地最主要的語言，又強調英語有助融和各種族。⁸ 議會成員認為家長有替孩子選擇學校的自由，英文學校應尊重家長的意願，收容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童。⁹ 這些壓力影響了政府政策。其後新加坡政府的「十年建校計劃」強調英校是「馬來亞意識的搖籃」(nursery of Malayan-minded)，容許家長自由選擇把孩子送入英文學校就讀。十年計劃政策制訂者對方言學校抱懷疑的態度。然而，鑑於當時學校不足，政府還是建議擴大對學校的補助制度(grant-in-aid-system)，讓辦學表現良好的方言學校替優秀的學生提供免費教育。¹⁰

然而，其後的政治局面使新加坡殖民政府以更強硬的手段處理華校問題。在一九四九年馬來亞共產黨潛入地下，改以暴力抗爭的方式對殖民地當局進行鬥爭(Clutterbuck, 1984; Stenson, 1969)。華校當時被馬共滲透，不少教師及學生都支持共產黨。此外，隨著中國內戰進入決定性的關鍵時刻，中國大陸各政治勢力(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民主同盟等)積極的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新加坡的華校愈來愈

⁵ "A Plan for Future Educational Polic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dvisory Council Paper No. 15 of 1946, Appendix I, *The Ten Years' Program*, p. 11.

⁶ 全上。方言學校是治指馬來文、華文、及淡米爾文學校。

⁷ 新加坡諮詢議會是戰後初年新加坡軍管時期所設的，它的功能是諮詢民意，幫助政府釐訂政策。

⁸ Minutes, the 29th public session, Advisory Council, Colony of Singapore, 7th August, 1947, Appendix IV, *The Ten Years' Program*, p. 29.

⁹ Minutes, the 29th public session, Advisory Council, Colony of Singapore, 7th August, 1947, Appendix IV, *The Ten Years' Program*, p. 29.

¹⁰ *The Ten Years' Program*, pp. 6-9.

受到來自中國的政治影響(Chui and Hara, 1991; Wong, 2002, p.53)。殖民地政府深信華文學校的存在有礙反共鬥爭、不利新加坡建立在地(local)身份認同。因此，政府在翌年(一九五零年)推出「十年補充計劃」(Ten-Year Supplementary Plan)。連同上一年的「十年建校計劃」，當局每年興建二十三所英文學校。一旦計劃完成，英文學校的就學人數會從42,000 增加到128,400，方言學校學生人數將從72,000 降到25,000。¹¹ 政府相信這計劃有助反共以及建立新加坡人民的本土意識。殖民政府的替代策略引起華人社會的強烈反彈。不少華人領袖反對當局把外來的英國文化強加於華人(《南僑日報》，1950年7月18日)。新加坡華校教師總會質疑只有英文學校才能培養本土的、馬來亞為中心的意識(《南僑日報》，1950年7月18日)。馬來亞共產黨指責「英帝國主義者」陰謀消滅中國文化。¹²

爲了進一步推行替代策略，新加坡政府於一九五一年推出新的學校補助計劃。殖民地當局願意把華文學校的補助金額增加一倍，條件是要政府資助的學校接受更嚴格的監管。新的補助計劃明訂一旦英文學校最低年級學額足以收容所有六歲學童時，政府將停止補助華文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到了第二年政府停止補助申延至華校二年級；直至最後完全撤銷補助華文學校爲止(《星洲日報》，1951年5月12日)。此外，教育當局又宣告一旦政府開始撤銷華校的財政支持，英文學校將免收學費(《星洲日報》，1951年5月16日)。新的學校補助計劃引發新加坡華人更激烈的抗爭(Wong, 2002, p. 133; 2003, p. 245)。

然而，其後一連串突發事故導致當局的錯誤估計，替代策略在一九五零年代早期遇到極大的困難。首先，新加坡政府低估了適齡就學人口的增長。英國人在一九四九年時曾預

¹¹ *Supplement Program*, pp. 118-9.

¹² Translation, *Freedom News*, issues 23, 15 June 1951, CO 537/7288.

估到了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將有 217,000 名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¹³ 然而四年後，政府發現當初低估了戰後的嬰兒潮，正確的數字應是 258,129。¹⁴ 其次，韓戰爆發導致物質資源的短缺，影響了政府建校的速度。¹⁵ 此外，政府其他的公共建設搶佔資源，進一步拖慢學校建設計劃。¹⁶ 因為這些原因，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五二年、及五三年間分別只建立了十九、九、及十所英文小學，遠低於每年二十三所學校的目標。¹⁷ 替代策略執行不順利，使政府無法壓抑華文學校的增長——從 1950 至 1954 年間新加坡的華校生人數持續上升，¹⁸ 英文學校學生人數佔整體在學總人數不到一半。¹⁹ 明顯地，政府需要調整處理華文學校的策略。

英化策略(Anglicization Approach)

英化策略的目的是要把華文學校的教學語言從華文改為英文。執政當局相信這政策會縮短華文學校及主流的英文學校的文化差距；減弱華校的身份。殖民地政府官員們大概認為隨著替代政策的失敗；華文學校繼續存在，把華文學校轉變成較不具威脅性的形式是明智的策略選擇。

¹³ *Supplement Program*, p. 118.

¹⁴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3rd Session, 1953, Colony of Singapore*, 20 October 1953, B 320.

¹⁵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1st Session, 1951, Colony of Singapore*, 16 October 1951, B 296-298.

¹⁶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3rd Session, 1953, Colony of Singapore*, 20 October 1953, B 322.

¹⁷ "Progress Report on the Education and Medical Plans as on 31st December 1952,"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3rd Session, 1953, Colony of Singapore*, C16.

¹⁸ "A Place in School,"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4th Session, 1954/1955, Colony of Singapore*, C106.

¹⁹ 在一九五三年新加坡中小學學生總數是163,000，其中只有71,000（約45%）就讀於英文學校（*Straits Budget*, October 22, 1953）。

一九五三年十月，新加坡總督尼高(John Nicoll)抱怨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童就讀於英文學校，他擔心這情況不利促進種族融和。爲了彌補這缺陷，尼高建議華文學校同時採用英文及華文教學(*Straits Budget*, 22 October 1953)。其後，新加坡教育署長麥利倫(D. McLellan)宣告政府將大幅增加對華文學校的財政補助，但條件是要求華文學校實行「新加坡化」(Singaporeanization)——採用以新加坡爲中心的課程及改用英文及華文兩種語言教學(《新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

尼高及麥利倫宣佈的新政激怒了華人。華文學校的校長公開指出華校一直都設有英文課，本來就實行雙語教育，因此不知道政府新政目的何在(《星洲日報》，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三日)。新加坡華校聯合會強調華人子弟有權以母語接受教育。他們又指出倘若華校需要改善英語水平，英文學校也要改善華語水平(《星洲日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七日)。左派人士批評政府雙重標準，只要求華校實行「新加坡化」，但從來沒有施壓要跟隨英國的課程模式；對培養本土意識毫無貢獻的英文學校「新加坡化」(《新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七日)。

雖然受到華人社會猛烈的攻擊，殖民政府還是在同年的十二月八日把相關的「雙語教育」政策文件呈交立法議會討論。該份文件強調政府希望華校學生兼具英文及華文的能力，成爲殖民地的好子民(good citizens)。它建議把已接受政府補助的華校的補助金額增加一倍，又設立新的補助辦法資助尚未獲得政府財政支持的華文學校。然而，一旦接受政府補助，華文小學必須有三分之一的教學時數以英文教授；到了初中階段，這比例上升至二分之一；到了高中，增加至三分之二。²⁰ 是項政策很快便得到立法議會的通過。²¹

²⁰ "Chinese Schools-Bilingual Education and Increased Ai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3rd Session, 1953, Colony of Singapore*, No. 81 of 1953, C 542-547.

雙語教育政策激起了華人團體的強烈抗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當地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公開呼籲華校抵制新政策。商會的發言人宣稱倘若華校接受這政策，就無異背叛華裔祖先及後代（《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其後，一百多所華文中、小學的代表開會一致通過反對新政（《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華文教育團體又選出代表起草備忘錄以示抗議（《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

因為華人社會強烈的反彈，殖民地當局被迫要作出讓步。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教育署長麥利倫對雙語教育政策重新解釋。他指出政策的主要精神是要培養華校學生的英語及華語能力，原政策文件建議的華校英語教學時數只供參考。麥利倫保證只要華校小學六年級、中學三年級、及中學六年級學生的英文水平能分別達到英文小學三年級、小學五年級、及中學一年級的水平，政府就不會介意它們採用英語教學的時數（《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教育署長又邀請華校參與新的學校補助計劃（《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

殖民當局願意在教育政策作出讓步，因為原有的政策危害他們的統治地位。政府英化華校的做法激怒了華人群眾，結果使馬來亞共產黨得以攻擊政府、壯大反英抗爭的聲勢。此外，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種種跡象顯示馬共在教育、勞工、及婦女等多個領域已佔據著有影響力的位置。殖民地政府當務之急是爭取華人群眾支持對共產黨的鬥爭（Lee, 1996; Wong, 2002, p. 137）。因此，政府必須調整容易引起華人反感的政策。

因為殖民當局改變政策，沒有繼續要求華校放棄以華語教學，華人的不滿情緒得以緩和。中國總商會及華校董教聯

²¹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Council, 3rd Session, 1953, Colony of Singapore, 15 December 1953, B 386-391.*

合會決議呼籲華校向政府申請參與新的補助計劃（《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不到一個月，已有七十八所華文學校提出申請（《星洲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平等化策略（Equalization Approach）

一九五五年新加坡社會的幾個重大事件迫使政府給與華人更多的讓步。首先，隨著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進展，新加坡於當年四月舉行第一次大規模的公民投票（public election）。新的憲法規定立法議會——新加坡最高立法及政策制訂機構——絕大多數成員由普選產生。這改變導致有意競逐權力的政黨必須爭取佔整體人口超過70%的華人的支持（Yeo, 1973; Yeo and Lau, 1991）。其次，馬共在一九五五年進一步滲透至華校（Lee, 1996; Wong, 2002, 2003）。爲了爭取華校主管支持反共鬥爭，政府須避免與整個華文教育界發生衝突。此外，華文教育運動在一九五五年達到高峰。在是年六月六日，五百多個華人團體的代表出席保衛華教大會，會上並成立華文教育委員會爭取政府平等對待華文學校（《星洲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新報》，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這種種因素迫使統治當局不敢輕舉妄動打壓華校。

一九五五年四月，福利巴士工潮導致嚴重的衝突。大批華文中學學生到場聲援罷工工人（Cultterbuck, 1948, pp. 108-9）。到了五月十二日，罷工演變成暴動，結果四人死亡，三十一人受傷（*Straits Budget*, 19 May 1995）。翌日，衝突進一步擴大，二萬多名從事不同行業的工人加入罷工的行列（《星洲日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新上任的、民選的勞工陣線（簡稱「勞陣」）政府抱怨華校學生介入工潮，導致矛盾激化，結果宣佈關閉三所華文中學（*Straits Budget*, May 19, 1995）。三所華校的學生迅速反彈，號召其他華文學校學生共同採取行動譴責政府。其他多所華文中學學生迅速

響應（《星洲日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新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及十九日）。「勞陣」政府答應撤回對三所華校的禁令，但條件是要校方開除發動學生介入工潮的頭目。政府的處理手法進一步激怒了學生，導致二千多名學生佔據中正中學校園與警察對峙。多所華文中學的學生又進行罷課（*Straits Budget*, 19 May 1955；《新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學生的抗爭得到多個工人組織的支持（《星洲日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新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隨著形勢的惡化，「勞陣」政府在立法議會受到其他政黨的猛烈攻擊。結果，「勞陣」在五月十八日成立九人委員會深入調查華校問題。該會成員來自在立法議會中佔有席位的政黨，故此又稱為「各黨派委員會」（*Straits Budget*, 19 May 1955）。「勞陣」此舉主要是因為它的群眾基礎薄弱，必須通過提供更廣泛的參與機會而增加本身的合法性。²²「各黨派委員會」參閱了八十七份民間團體的意見書，又會晤多名相關人士，最後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向立法議會呈交「各黨派報告書」。

「各黨派報告書」建議新加坡政府徹底改變過往的華校政策。它指出華校的存在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要壓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華人的語言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它認為應積極的把華人的語言及文化用作建立新的新加坡及馬來西

²² 「勞陣」於一九五五年大選只獲得26% 的選票及十個民選議席（當年共有二十五席位開放讓各政黨競逐）。「勞陣」能低票當選，因為人民行動黨成立不久，羽翼未豐，只派出四位參選人；傳統的政黨——例如進步黨及民主黨——缺乏華人群眾的支持。大選過後「勞陣」主席馬歇爾（David Marshall）起初不大願意上台執政。但後來因為在選舉中共獲得二席的馬來聯合會（United Malay National Association）及馬華公會（Malay Chinese Association）願意與「勞陣」合作，加上總督尼高答應委任兩名「勞陣」支持者加入立法議會，馬歇爾才答允上台（Yeo, 1973; Yeo and Lau, 1991）。

亞文化。²³ 各黨派代表又建議平等對待英文、華文、馬來文、及淡米爾學校。具體的做法是制定涵蓋所有學校的教育法規（Education Ordinance）、提供華文學校全額補助、給與華校教師相等於英校教師的薪酬。²⁴ 此外，報告書建議讓華校繼續保留中文國語（mandarin）為教學語言。然而，因為新加坡多元種族的背景，學生必須掌握其他族群的語言，華文學校應教授第二（英語）及第三語言（馬來語或淡米爾語）。²⁵ 「勞陣」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發表「教育政府白皮書」，基本上完全接納了各黨派報告書的建議。²⁶

平等化政策代表了國家的統治者對華人社會的讓步。因為它承認華校是新加坡教育系統中其中一個獨立明確的類別（independent and discrete category）；維持了華校的身分。然而，平等化政策的本質是一個霸權策略（hegemonic strategy），因為它要求華校必須採用新加坡為中心的課程、改組學校的管理委員會、嚴明學校的紀律、以及禁止學生參與政黨及工人運動。²⁷ 接言之，國家讓步是為了要換取學校的合作，配合培養具本土意識的新加坡公民及清除共產黨在華校的影響力。此外，平等化策略促成華文教育運動的分裂，削弱了馬共的社會基礎。因為新政策大幅度改善對華校的補助以及華校教師的待遇，又承諾讓華文學校維持以華語教學，傳統的華文教育團體——例如新加坡華文學校聯會、華文中學教師會等——對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反應甚為溫和（《星洲日報》，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及六日）。然而，左派團體的反應卻十分激烈。比方說，多個華文小學校友會發表聲明嚴詞譴責政府意圖以增加財政補助的手段干預華文學校內部運作（《星洲日報》，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新加坡華文小

²³ *All Party Report*, p. 4.

²⁴ *Ibid.*, pp. 6-7, p. 19, p. 34.

²⁵ *Ibid.*, pp. 9-10 and 39-44.

²⁶ *White Paper*, p. 5.

²⁷ *All-Party Report*, pp. 15-16, 20-24, and p. 27.

學教師會及華文中學生聯合會批評政府要求華校教授英語為第二語言，無異於把帝國主義的語言強加與華人（《星洲日報》，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六日及十九日；《新報》，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明顯地，平等化政策使左派團體與其他華人社會人士出現分歧，有助新加坡執政者孤立它最主要的敵人——馬來亞共產黨。

香港

戰前的華化（Sinicization）政策

戰前香港的華文學校大多數由私人興辦，以華文作教學媒介。它們與主流的、以英語教學的學校有所差異。然而，與新加坡的華校相比，香港華校的文化特殊性顯得較為薄弱。在二次大戰前有兩大因素導致香港華文學校的身份變得模糊。首先，香港是溝通中國大陸及西方的重要橋樑。十九世紀時英國人佔領香港，是為了取得進入中國的一塊踏腳石，英帝國主義者希望香港的學校培養通曉英文及中文的雙語人才，以便擔任中國與西方的中間人。因此，主流的、以英文為主的學校——中英文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s）——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便把中文列為必修科目。²⁸ 中英文學校的校長一再強調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必須學習中文（Cheng, 1978, pp. 42-44; Ng-Lun, 1983）。結果，華文教育並非華文學校的專利，香港華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差別亦遠低於新加坡。

此外，來自倫敦的壓力亦導致香港教育系統的華化。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倫敦的「英屬非洲熱帶區域土著教育諮詢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Native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Tropical African Dependencies）——當時大英帝國最主

²⁸ 中英文學校的學生幾乎都是華人。香港的英文學校數量極少，學生大多是外籍人士。

要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諮詢部門——建議英國的殖民地盡可能採用本土方言作為基礎教育的教學語言（Sweeting, 1990, pp. 344-5; Whitehead, 1991, pp. 385-421; 1995, pp. 1-4）。諮詢委員會提出是項建議，是爲了要避免在其他殖民地重演印度的歷史——當時因爲英文教育過度膨脹，大量受過高深英文教育者失業，結果出現反英強烈的情緒（Whitehead, 1991, p. 391）。其後，在一九三四年，英國視學官賓尼（Edmund Burney）被倫敦委派檢討香港教育。一年後，賓尼報告書發表，批評香港政府對使用中文的小學教育支持不足。它勸喻當局調整教育政策，重點培養學生運用母語表達溝通的能力（Sweeting, 1990, pp. 355-56）。

賓尼報告書對香港教育政策產生影響。在一九三六年，殖民當局把使用英文教學的元朗官立鄉村小學改爲中文小學。三年後，政府在中英文學校試用中文教授部份低年級科目（Sweeting, 1990, p. 357-59）。這些政策縮短了華文學校與其他學校的文化鴻溝，也爲戰後的華化政策奠下了基礎。

戰後的華化政策

二次大戰後，倫敦繼續施壓要求殖民地以母語發展教育。英國在戰後國力急劇衰退，加上在多個殖民地及國際舞台上受到反殖運動的衝擊（Kennedy, 1991-92; Louis, 1977, 1985; Tarling, 1993）。面對這些挑戰，英國答允推動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成長。因爲教育被視爲是政治及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倫敦承諾在殖民地擴展「基礎兼相關」（basic and relevant）的教育（Holford, 1988; Whitehead, 1989）。

一九四七年八月，「英國殖民地發展及福利委員會」（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Committee）的「教育及文化小組」（Education and Cultural Sub-Committee）的總報告書送抵香港。報告書批評殖民地過往過度著重發展使用英文的

中學教育，導致學校體系頭重尾輕的現象。爲了糾正這偏差，它建議政府增設使用方言的小學。²⁸ 倫敦的意見在香港得到支持，華籍立法會議員——例如周錫年及周俊年——在議會中勸諭政府大力推動母語教育。²⁹

二次大戰後初年香港政府希望殖民地學校銜接中國大陸的教育系統，結果進一步推動了華化策略。戰後初期香港大學——殖民地唯一的大學——前途未卜。³¹ 殖民當局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表示希望增強中英文中學學生的中文訓練，方便學生畢業後到中國大陸升讀大學（《華商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政府又將中文國語(Mandarin)列入所有接受政府資助學校的課程；以及要求在小學階段盡量使用粵語授課。³⁰

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教育司署署長勞維爾(T. R. Rowell)向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殖民地最主要的教育政策諮詢部門——公佈政府發展方言學校的計劃。他建議中英文學校使用方言教學至初中二年級。勞氏又透露政府計劃修改「資助則例」(the subsidy code)，以便私人辦理的華文學校獲得更多的政府財政支持，提供更具素質的教育。此外，教育署長表示政府將於元朗及大埔開辦華文中學及在新界地區增加二十所華文小學。³² 同年，政府的教育司署年報透露當局計劃在未來十年創辦五十所華文中學（《華僑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²⁸ HKRS 41, D&S 1/3326.

²⁹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5 September 1946 Session, p. 120 and 27 March 1947 Session, pp. 69-70.

³¹ 香港大學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初年英國殖民當局曾有建議停辦該大學。經過一番辯論，倫敦在一九四八年決定繼續維持香港大學(Sweeting, 1998)。

³⁰ *Annual Report of Education, 1946-47*, p. 6.

³² Minutes, Board of Education, 8 April 1947, HKRS 147, D&S 2/2(i).

然而，殖民地政府的華化策略在五零年代初期遭受兩次打擊。在一九五零年四月，香港政府宣告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取消中文作為香港大學入學考試必考科目的規定(*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April 1950)。政府的新政策引起了部份本地團體——例如華人革新會(一個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政治團體)——的批評(《華僑日報》，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九及三十日)。但是，也許因為當時教育並不普及，香港大學入學考試只牽涉極少數人的利益，整體社會對新政策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新的香港大學入學考試辦法並沒有使殖民地學校出現去華化(de-Sinicization)的現象。因為除非得到校長的許可，就讀於政府辦理及補助學校的華籍中英文學校學生還是必須修讀中文課(《華僑日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其次，中英文中學會考中文科考生的人數持續增長。在一九四九年，當時中文科還是會考必考科目，有469(82%)名考生參加中文科的考試。到了一九五一年，中文已被一分為二為「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及文學」兩個科目，同時中文已不再是會考的必考科。可是考生人數不降反升，一共有791(90%)人選考「中國語文」，721(83%)選考「中國歷史及文學」³³ 此外，中英文學校的中文程度從來不被視為是低於華文學校的。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政府新聞處發言人指出中英文學校與華文學校學生中文水平大致相同(《華僑日報》，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大約十年後，《華僑日報》報導中英文中學畢業生在中學會考中文科的表現不差於華文中學的考生(《華僑日報》，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五日)。華文學校在中文教學上沒有顯出優勢，因此缺乏建構鮮明文化身份的條件。

教育署長勞維爾在一九五零年提出的「十年建校計劃」對華化策略帶來另一個打擊。也許因為擔心一九四九年中國

³³ Education Department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 September 1951, HKRS 41, D&S 1/1942(i).

大陸赤化對香港政局的衝擊，勞氏認為一旦殖民地的年青人都能聽、講、及閱讀英文，他們對「別有用心者」的政治宣傳將較具判斷能力，殖民地的局面也會較為穩定。他建議在未來十年大量興建英文學校，增加 10,000 個英文學校名額。³⁴ 然而，「十年建校計劃」在教育委員會受到質疑。該會的兩位成員——羅文錦及賴恩神父 (Father Thomas Francis Ryan)——認為 10,000 學校名額遠遠低於殖民地的需求。他們指出兒童失學、到處遊盪，對殖民地的安全將帶來更嚴重的後果。教育委員會後來表決，一致認為教育擴展對維持香港政局穩定甚為重要，建議政府增加 50,000 學校名額。³⁵ 其後，香港政府對失學兒童進行登記，結果發現有 21,906 學齡兒童沒有機會到學校就學。³⁶ 明顯地，香港政府需要以有別於「十年建校計劃」的方式加速教育發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殖民地當局把所有官立中英文小學改變為以華文教學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July 1951)。同時，政府又華化殖民地的師資培訓制度，訓練小學教師使用粵語教學。在一九五零至五一的財政年度，政府成立葛量洪師範學院，專門訓練以粵語教學的小學師資。³⁷ 大約十年後，當局創立了另一所性質相同的學校——柏立基師範學院。³⁸ 殖民地政府選擇以華文發展教育，極有可能是因為方言學校的成本遠較英文學校低廉。當局的政策進一步華化教育系統——到了一九五八年，除了少數幾所的中英文小學，香港的

³⁴ "Ten Year Plan," outline of proposal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Board of Education, drafted by T. R. Rowell, April 1950, HKRS 147, D&S 2/2 (i).

³⁵ Minutes, Board of Education, 2 June 1950, HKRS 147, D&S 2/2 (i).

³⁶ "Report on Unschooled School-Age Children," September 1950, HKRS 147, D&S 2/2 (i).

³⁷ *Annual Repor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1-52*, p. 53.

³⁸ *Triennial Survey, Education Department, 1964-67*, p. 55. 香港當時另一師資培訓機構——羅富國師範學院——主要負責訓練中學師資。

小學都採用中文教學。³⁹ 殖民政府的政策把華文吸納結果在小學階段消滅了華文學校的「他者」(the Otherness)，間接地模糊了華文學校的身份。

香港政府在一九六四年進一步華化教育系統。當時候有好幾所接受殖民當局補助的名牌小學從一年級開始教英文，並使用英文教學。這做法有違政府的規定，因為當局的政策是要學校從小學三年級才開始教英文，並要求在小學階段以粵語教學。教育司署官員認為此數所小學違規使用英語，加重了學生的負擔(*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9 1964)。此外，社會人士批評這數所名牌小學「偷步」提前教英文導致不公平的情況，因為當時候小學畢業生必須參加升中考試，以決定是否有機會升讀中學，而升中考試的其中一個科目是英文。為了維持公平競爭，當局「極力勸諭」這些名牌小學不要過早教英文，並且考慮倘若這些學校屢勸不改，將在適當時候取消它們的財政補助。⁴⁰

因為政府的多項政策把中英文學校去英化(de-Anglicized)，華文學校沒有出現清楚明確的身份，中英文學校學生在語言及文化方面與華文學校學生有極高的相似性。因此，香港政府免於像新加坡政府般需要整合華校及其他學校畢業生的難題。此外，當局的政策把中國語文及文化吸納至學校系統，殖民政府的敵人難以攻擊執政當局歧視華人文化，間接地穩定了殖民地社會的秩序。

結語

本文討論二次大戰後新加坡及香港國家權力形構與華文學校身份的相互關係。從這兩個歷史個案，我們看到國家

³⁹ *Triennial Survey, Education Department, 1958-61*, pp. 28-9.

⁴⁰ "Policy regarding Anglo-Chinese Primary Schools," Director of Education, 6 July 1964, HKRS 147, D&S: 3/17.

政策往往帶來意料之外的；具諷刺味的(ironic)後果。在新加坡，戰後殖民地政府試圖以擴展英文學校及強迫華文學校改用英文教學的手段消滅華校。然而，因為華人的強烈反對，這些政策宣告失敗。其後，新加坡的去殖民地化帶來了普選政治，佔人口大多數的華人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大，結果迫使統治者承認華校是新加坡國家教育系統的一部份，答允平等對待華文學校。香港的歷史情況與新加坡迥異。二次大戰後殖民當局幾乎從來沒有意圖消除華文學校的身份，然而政府的政策卻導致整個學校系統的華化，削弱了華文學校的文化特殊性。

新加坡及香港的歷史比較個案顯示國家政策的目的及後果的關係是甚為微妙的。從兩個歷史個案我們又可觀察到國家權力形構與教育的關係是辯證的(dialectical)、相互的(recursive)、受特殊歷史條件所影響的。首先，新加坡的情況顯示國家政策往往受到多種因素所影響，政策制訂者的意圖(intention)不能決定政策執行的結果。舉例而言，新加坡的執政者曾試圖以替代及英化的手段消滅華校。但礙於國家建校能力(capacity)不足，以及公民社會的抗爭，替代及英化政策以失敗告終。其後，因為政治制度的改變，公民社會保衛華文教育運動的蓬勃發展，加上馬來亞共產黨的日益壯大，新加坡的執政者被迫改以平等化策略處理華校問題。平等化政策平息了部份華人的不滿，一定程度孤立了馬共。然而，這政策維持華文學校鮮明的身份，華校與其他學校畢業生繼續存在巨大的文化及語言鴻溝，執政當局需要面對因教育系統不連貫所導致的社會整合難題。

香港的歷史個案呈現了國家與教育的另一種複雜的關係——國家政策經常導致出乎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結果是預防了社會的分裂與衝突。舉例而言，香港殖民當局為了維持香港與中國大陸教育系統的連貫性，以合乎經濟的手段擴展教育而製訂教育政策。這些政策在無意中減弱了華文學校與其

他學校的文化區別，使政府不必受到華校身份太強而導致社會分化的問題所困擾。此外，政府政策帶來整個學校系統的華化，敵對勢力亦難以攻擊殖民當局歧視華人的語言及文化。結果是微妙地改變了香港國家權力形構的發展軌跡。

參考文獻

官方出版文獻

Annual Repor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1946-47, 1951-52.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47.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lony of Singapore, 1951, 1953, and 1954/55.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All-Party Report]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6).

Supplement to the Ten-Year Program, Data and Interim Proposals [Suppl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ony of Singapore), undated.

Ten-Year Program: Data and Interim Proposals [Ten-Year Program]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eptember 1949).

Triennial Survey,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8-61 and 1964-67,

“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in *Legislative Assembly, Singapore, Sessional Paper*, No. Cmd. 15 of 1956.

官方機密檔案

CO 537/7288

HKRS 41, D&S 1/1942(i)

HKRS 41, D&S 1/3326

HKRS 147, D&S 2/2(i)

HKRS 147, D&S 3/17

報章

《南僑日報》，新加坡。

《星洲日報》，新加坡。

《新報》，新加坡。

《華商報》，香港。

《華僑日報》，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香港。

Straits Budget (《海峽時報每週摘要》)，新加坡。

書籍及期刊文章

Basil Bernstein,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II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Cheng Man-Ki, "The Central School -- the Earlie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Shih Ch'ao: A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Society, United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4 (June, 1978), pp. 34-55.

Chui Kwei-Chiang and Fujio Hara,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Pro-China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1).

Richard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imited, 1984).

Andy Green,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New York, NY: St. Martin, 1990).

John Holford, "Mass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1940-1960: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of Lifelong Education*, Vol. 7, No. 3 (September 1988), pp. 163-83.
- Joseph Kennedy, "The Ending of a Myth -- the Fall of Singapore, 1942," *The Historian*, No. 33 (Winter, 1991-92), pp. 3-8.
-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941-194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 William Roger Louis, "American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3 (Summer, 1985), pp. 395-420.
- Ng Lun Ngai-Ha,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and Publ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60-19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LAHA Conference, Manila, Philippines, 1983).
- Michael R. Stenson, *Repression and Revolt: The Origins of the 1948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1969).
-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 Anthony Sweeting, "Controversy Over the Re-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in *Dispersal and Renewal: Hong K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Years*, edited by Clifford Matthews and Oswald Cheu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7-424.
- Nicholas Tarling, *The Fall of Imperial Britai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live Whitehead,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British Colonial Education Policy,"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18, No. 3 (1989), pp. 267-93.
- Clive Whitehead,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1924-1961,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 27 (March 1991), pp. 385-421.

Clive Whitehead,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Education: A Ca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or Enlightened Paternalism?"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24, No. 1 (1995), pp. 1-15.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2).

Ting-Hong Wong,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Chinese School Identity in Postwar Singapo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6, No. 2 (June 2003), pp. 243-272.

Ting-Hong Wong and Michael W. Apple, "Pedagogic Reform in Singapore: Rethinking the Education/State Formation Connec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6, No. 2 (May 2002), pp. 182-210.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Yeo Kim Wah and Albert Lau,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1945-1965," in *A History of Singapore*, ed. by Ernest C. T. Chew and Edwin Le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7-53.

93.9.15

來源 購

國書價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 / 林本炫，鄒川雄編。——初版。——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社所，2004[民93]

面：公分。——（教育與社會叢書；7）

ISBN 957-8210-43-4(平裝)

1. 教育改革－論文，講詞等 2. 教育－臺灣－
－論文，講詞等

520.7

93002459

臺灣師大圖書館



BM0284039

教育與社會叢書 7

教育與權力：

2004年3月初版

編者：林本炫、鄒川雄

發行人：蘇峰山

出版者：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32號

電話：(05)272-1001 轉 2311

傳真：(05)2427150

網址：<http://www.nhu.edu.tw/~edusoc/>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定價：250 元

ISBN 957-8210-43-4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教育與權力

一個批判的分析

林本炫 鄒川雄◎編